

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的碰撞？ ——兼论文学翻译的对话策略

夏忠宪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发现之一。本文将哲学上的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为理论基石，通过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策略，侧重从方法论意义上思考在凸显主体性，尤其是译者主体性之后文学翻译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揭示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于文学翻译多方面的意义：第一，重新认识文学翻译活动的规律，即文学翻译是言语交往和对话的存在。存在（бытие）之所以能成为生机勃勃的共在（со-бытие），靠的是主体间的共存、交流和对话。第二，进一步认识在文学翻译跨文化交流中坚守时间、空间和文化上的外位性立场的重要性；第三，探讨文学翻译的建构术以及创新问题。

关键词 自我与他者 主体间性 对话策略 建构术 方法论启示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Dialogue strateg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Xia Zhongx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khtin's dialogical theory of the 20-th centur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discover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and Bakhtin's dialogue strategy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from philosophy, the present paper has probed in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y are co- being of exchanges and dialogue among multi- subjects. The paper has got some implications on methodology from Bakhtin.

Keywords : I and another, intersubjectivity, dialogue strategy, **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 methodology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发现之一。对话思想博大精深，我们仅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角度探讨相关问题，揭示巴赫金在 worldview、方法论、行为策略、创造能力等方面体现出的智慧。换言之，探讨巴赫金如何智慧地处理一系列的二元对峙；如何以悖论的方式表现出对和谐、对创新的追求，尤其是从方法论意义上思考在凸显了主体性之后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艺学中悄然发生的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这一转向是在凸显单一主体性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即出现了被弗来德·R·多尔迈称为“主体性的黄昏”^[1]的现象，并试图摆脱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此背景下，彰显主体间性的理论应运而生，它力求突破认识论的局限，不再将把握世界的活动看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在、交往与对话，其主要的任务在于：1、力求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2、探究本体论，即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间性的关系。因此，彰显主体间性，首先具有哲学、美学、文艺学本体论的意义，其理论依据在于存在本身。存在不是在主客体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主体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交往与对话。这也是由于人文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人文科学，尤其是像文学、文学翻译等，以诗学功能为主导，属于精神现象的学科，在把握对象世界时，已经不满足于将其看作客体，而是视为人格化的对象主体，更看重审美、直觉、想象、情感、体验等，并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和平交流关系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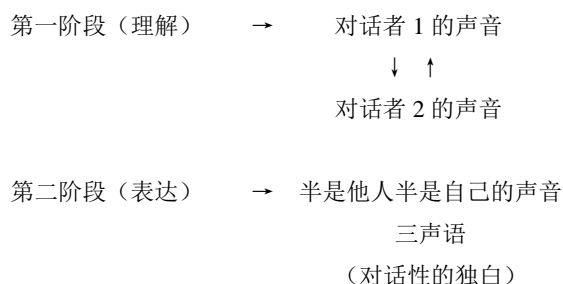
巴赫金是最早关注这些问题并在这一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理论家之一。纵观巴赫金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终生致力于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如何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各种“间性”研究的问题。“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在这里可作宽泛的理解，即理解为探讨“主

体间性”问题。例如，在交谈中，如果说话人被视为“自我”，那么，交谈的对方则是“他者”；在创作活动中，如果作者被视为“自我”，那么，作者之外，包括他所创造的主人公，均为“他者”；在阅读活动中，如果读者被视为“自我”，那么，读者之外的一切，包括作者、作者所创造的文本，均为“他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如果译者被视为“自我”，那么，译者之外的一切，包括原文作者、作者所创造的文本，原文读者、译文读者等均为“他者”。如此类推。根据巴赫金的“行为哲学”，每个人都是从“我之自我”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方位和时间出发，去应对(去履行其责任)其他的自我和异己世界的，扩展来看，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包括认识活动、伦理活动，审美活动等)亦即如此。

二、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的碰撞？

在自我与他者碰撞时，巴赫金所采取的策略，或者说所持的立场是对话，而不是对抗。这里先要弄清几个关键词，或者说巴赫金的理论术语。如：“共在”（событие 又译为事件）、外位性立场（позиция 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и）、“视觉盈余”（избыток видения）（又译为“超视”）、创新以及“建构术”（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等。这里还涉及到对待“他人话语”的对话态度，如何转述他人话语的问题，即俄罗斯学者 Гоготишвили Л. А.所说的“声音交替的策略”（стратегия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голосов）的问题等。

一般而言，对话分为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如图所示：



对话的前提是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相遇，都有相互理解的愿望。只有主体间性的意识发展到适当程度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人。这是因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性的协调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证着对话人主体性发挥的合理性，又强调对话人各自发挥主体性时必须给其他主体留有合理发挥主体性的时间与空间，这种对他人主体性的关怀本身就是理解。在巴赫金看来，理解的过程一般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我进入他者世界，通过他者的视角来看世界。(但这时的我决不能与这一观察事物的视角完全融合，我置身于他者的位置，他者的视野之中(从其内部)，他者看不到的，我也看不到)。第二步，回归我自己的视野。(这时我不仅能从他者内部见他者之所见，而且能从其外部，即从我的立场来看他。不仅从他者的眼光出发，以他者的方式看事物，而且从我自己的眼光出发，以我的方式去看事物)。我观察的他者是一个人格化的客体。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界线是可以被跨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分界线，一方是我自主自为的主体性；一方是他者在我眼中的人格化的客体地位。当我观照他者时，我便跨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借助于想象，把他者看作主体（第一步）。然后回归到我的主体性(第二步)。他者与我相遇同理。

巴赫金致力于研究沟通的各种策略。“构造这些交流关系——无论是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还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那种结构性

力量，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建构术’，这是在彼此相异的事物之间形成联系的活动”^{[2] (106)}这是主体间的建构术（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巴赫金并未将自我视为封闭的自足体，而强调其开放性。他认为，他人利用他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可以看到我所看不到的东西，借助他人视野可弥补我的视力范围不及所造成的缺憾，可纠正我的误区和盲点。借助于他人视野，我可以了解到“他人之我”（я-для-другого），使自己全面地认识自己。

以审美活动为例，巴赫金认为，真正的审美观照必须有一个外在于审美客体的位置、视点——外位性立场。这是包括价值上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和涵义上的“外位性”。“一个绝对的意识，没有任何外位于自身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在而从外部限制自己的东西，是不可能加以审美化的。这样的绝对意识只能去接近去掌握，但不能作为一个完成的整体去观照。审美事件只能在有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3] (104)}换言之，审美主体的立场，既内在于审美客体，又外在于审美客体。据此，巴赫金提出了“视觉盈余”（избыток видения）（又译“超视”）的范畴。他强调，一个人由于其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巴赫金同时也看到，一个人由于身处特定的时空位置里，视觉是会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全面顾及，甚至会出现误区和盲点。例如，一个人的“我之自我”是无法看见的：看不见自己的外貌，看不见自己的死亡……而这一切只有别人才能看见。这是“他人特权”（привилегия другого）。巴赫金对他人和他人特权持友善态度。他并不像有些存在主义者那样，对他人充满敌意，视他人为地狱。他强调“这种超视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爱心<Важнейший момент этого избытка – любовь (себя самого любить нельзя, это – координа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还有“认同、宽容”（признание, прощение），“积极的（非复制的）理解、倾听”（активное(не дублирующее) понимание, услышанность……“这是公开的诚实的超视，是通过对话向他人展示的超视，是当面而非背地话语表现的超视。所有本质的东西都溶进了对话，作面对面的交流。”（Это открытый и честный избыток, диалогически раскрываемый другому, избыток, выражаемый обращенным, а не заочным словом. Вс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растворено в диалоге, поставлено лицом к лицу.）^{[4] (第5卷, 395)}

这里我们如何理解创新的问题，即如何转述他人话语的问题，也就是戈蒂什维利 Л. А.所说的“声音交替的策略”（стратегия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голосов）的问题呢？

巴赫金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认识对象不同，人文科学特殊的任务在于：“复现、转述、阐释他人话语”，即活生生的人的话语，而自然科学是“精密科学”，其任务在于“掌握实物的不会说话的对象”^{[4] (第3卷, 138)}。“精密科学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即人以智力观察物体，并表达对它的看法。这里只有一个主体——认识（观照）和说话（表述）者。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任何的认识客体（其中包括人）均可被当作物来感知和认识。但主体本身不可能作为物来感知和研究，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声音；所以，对他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4] (第4卷, 379)}而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其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4] (第4卷, 2)}换言之，人文科学是对话型的认识形态。“在人文科学中，准确性就是克服他人东西的异己性，却又不把它变成纯粹自己的东西（各种性质的替换，使之现代化，看不出是他人的东西等等）。”^{[4] (第4卷, 390)}

在巴赫金的术语里“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внутренне убед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在我们看来，它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创新”，它呈现出一种三声语结

构，即一个话语中包括三种或更多的声音：既不完全是自我的声音，又不完全是他者的声音，而半是他人半是自己的声音。在这个三声语结构的话语中对话性的独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地看是独白，整体上看是对话。在我们看来，这个三声语结构的话语只能产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相碰撞之后，是理想的对话的结果，而且只不过是无穷尽的对话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具有未完成的性质，而凭借它的“未完成性”可以将人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三、文学翻译的对话策略

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自我”与“他者”的交往活动，它应该成为巴赫金所说的，一个生机勃勃的“共在”(со-бытие)，之所以能够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主体的“共在”，靠的是主体间的共存、交流和对话。这里实际上凸显的是主体间性(интерсубъекность)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侧重从方法论意义上思考在凸显了主体性，尤其是译者主体性之后文学翻译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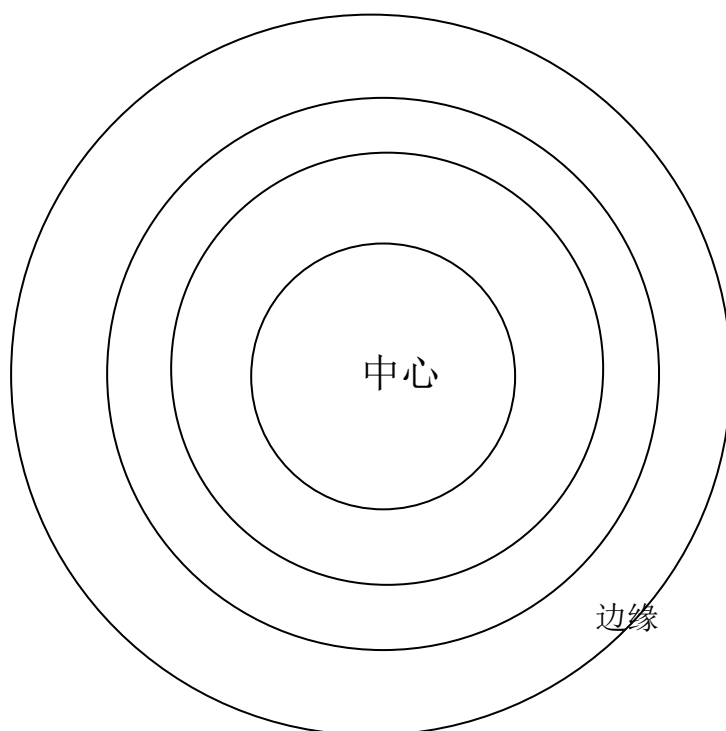
关于翻译的主体性问题早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从以文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集中研究翻译主体、主体性、主体意识等课题成果的相继问世，将我国译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翻译主体性研究的贡献在于，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模式，凸显了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然而，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凸显单一主体性的困境：主体性的理论缺陷突显出来，导致唯我论，单一、片面、极端，往往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主体性的自恋怪圈而不能自拔。

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自我与他者的碰撞，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协调建构的过程。我们采取的是对话策略。在此我们强调几点看法：1) 我们今天所提出的文学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的“阐释”(这关系到我们的理解)和“再现”；2) 文学翻译属于人文科学，它是通过理解和阐释来揭示话语的涵义并弘扬人文精神的，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3) 翻译是主体间的对话(这直接影响到文学翻译的目的(文学改编、满足市场需求等等)以及我们的翻译策略选择和表达)。例如，同一文学作品出版不同版本的译本：学院派版(研究、注释等)；普及版(配插图，图文并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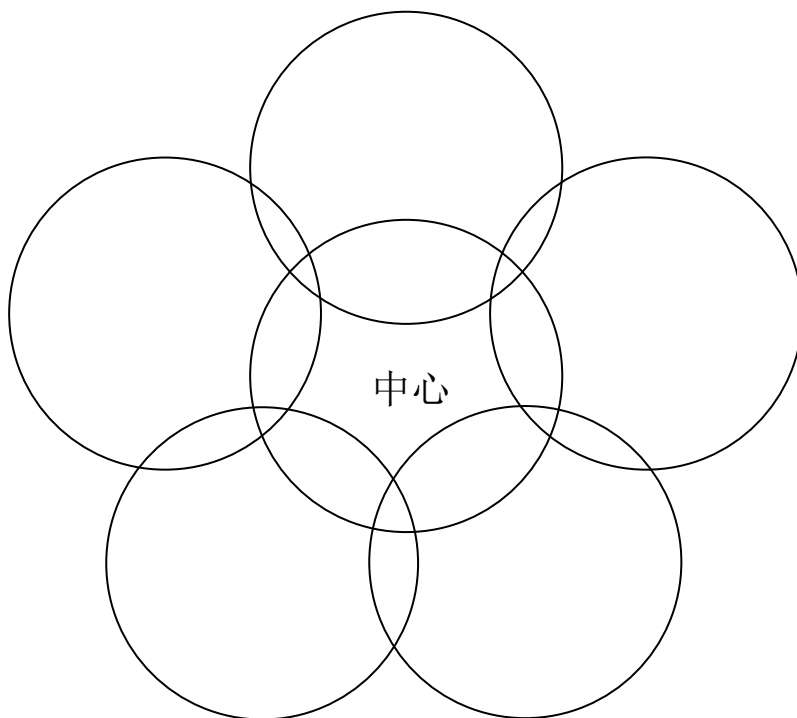
在我们看来，文学翻译活动既是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过程，也是认知过程。整个过程是不同的翻译主体间的交互活动。文学翻译活动中自我与他者的碰撞呈现更多的是多主体性，即主体间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将译者视为自我的话，参与对话的其他主体是原作者、原作读者、译文读者、委托人、赞助人等。但在以往的文学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一是对有些主体研究不够，例如，赞助人很少被视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但却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翻译过程。他们会利用其话语权直接影响译者译作过程及翻译策略选择等；二是总有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凸显单一主体性：或片面强调译者主体性(“译者中心主义”)，或强调原作者主体性(“原作者中心主义”)，或强调读者主体性(“读者中心主义”)……仅以强调译者主体性的理论为例，不少研究者从译者的文化地位从边缘向核心推移的角度探讨了译者的主体性从遮蔽到显现的历程，肯定了译者的文化地位和翻译家的主体地位。但如俄罗斯作家 К. И. 楚科夫斯基早在分析巴尔蒙特的译作时所指出的问题，即译者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美化”或修改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他发现巴尔蒙特译 лирика Перси Биши Шелли 加了很多词，让原作者奇怪地酷似巴尔蒙特他本人(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Высо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Принц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СПб.:ИД «Авалонь», Изд. Дом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стр.25),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原作者,然而“得到的却是一幅新面孔,一半是 Шелли,一半是巴尔蒙特,我称之为 Шельмонт”^{[5] (27)}

为什么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屡屡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凸显单一主体性的问题呢?这实际上是惯性的思维模式所致:即所有的价值以其空间的位置来决定,从中心到边缘。距中心越近,越趋完美,等级越高,越具权威。这种崇尚中心和权威的认识论,实际上遵循的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性原则”^{[6] (123)},即“一元论的原则”、“意识的统一性原则”。如果我们对凸显单一主体性的文学翻译活动加以描述的话,它呈现出下列图式:



为了摆脱崇尚中心的思维模式,我们倡导加强文学翻译建构术(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的研究。我们坚持的是多主体的协同建构原则,采取的是各主体间多元共处,有回应地相互对话的策略。如果我们对彰显主体间性的文学翻译活动加以描述的话,它呈现出来的则是下列图式: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建构图示。这里我们坚持的是多主体的协同建构原则,各主体间多元共处,有回应的相互对话。在文学翻译多主体间性的活动中我们倡导的是对话策略。在理解、阐释与再创造这一翻译活动中,各主体多元共存,相互作用,其发展相对自由,但多主体间性的活动中仍然需要中心,不过,中心在这里起的是主体间的协调作用,它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不可穷尽的对话中的一个环节。在文学翻译活动中“间性”的运用有一个度的问题。“间”而非“正中间”,三声语结构的话语中对话性的独白是不可或缺的,要根据翻译目的及翻译对象等决定译者的倾斜度,制定出最佳翻译策略。

从方法论上的意义上来看,它体现以下特点:

(1) 崇尚整体思维, 综合思维

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从一元视点或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都是有失偏颇的。文学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的提出为翻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启发人们不要从译者、原作者或读者某个单一的角度来考察翻译活动,而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研究。在主体间性视角下,我们尝试建构的是一个多元系统(полисистема),各子系统相互交叉,相互重叠,各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多元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动态的。我们崇尚的整体思维方式是将认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思考,强调各子系统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强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普遍联系。

美国学者菲立普(Philip D.C.)曾把整体论思想归结为三个彼此相联系的论断:1)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整体的各组成部分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任何分割都会损害这些联系;2)对一个整体,我们还能根据对部分的研究获得对整体的完全解释,因为分割已损害整体,分割后的整体已不再是原来的整体;3)对整体的研究应以整体为研究对象,使用整体的专门术语与理论。^①

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它推及于自然界,便产生了天地

^① 转引自刘劲杨,《光明日报》,2007年7月17日11版。

人交融互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崇尚整体思维，综合思维并不会妨碍人们按西方的分析逻辑思维进行科学探索，在对整体的理解上它们是互补的。

(2) 对话不是斗争，而是达到共识 (диалог – не борьба, а согласи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主张相容相济，相辅相成，各自扬长去短，彼此相观而善，以促成事物生生不息的健康发展。这是中国人的人生和文化的最高原则。二元对抗，“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用“绝对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中不包含任何肯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总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之中，把翻译本质问题遮蔽在混沌之中。单一的肯定和否定往往相互排斥，这实在是世俗之见，相互对话，乃是明智之举。在主体间性视角中，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主体群体活动，是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尊重，是主体与主体的互相交往与平等对话。

(3) 和而不同，通而不隔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相互依存，相互对话，在保持各自的差异、特殊性的前提下，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亦不是机械地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文学翻译是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相互协商，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关注主体间性的对话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话”贯穿着“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它倡导一种通而不隔的多元综合互补的原则。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推而广之，在中与外之间，在古与今之间，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在文学艺术世界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在文学艺术的价值与其他人类文化价值之间，在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圈的文学艺术之间，在文学艺术世界内部不同理论派别之间，打开壁垒，模糊界限，相互沟通、交流、补充、综合，而又不丧失自我，为各种文化艺术和文艺理论相互取长补短创造条件。“对话”强调的是一种双向的、平等的、自由的交流形式，在交流过程中把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各有所见又各有所蔽的理论转化为较为全面、完整、科学的理论。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策略，我们认识到它对于文学翻译具有以下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翻译活动的规律，即文学翻译是言语交往和对话的存在。存在 (бытие) 之所以能成为生机勃勃的共在 (со-бытие)，靠的是主体间的共存、交流和对话。第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在文学翻译跨文化交流中坚守时间、空间和文化上的外位性立场 (позиция внеаходимости) 的重要性；第三，探讨文学翻译的建构术 (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 以及创新问题。本文希望从巴赫金那里获得方法论上的启示，其最终目的是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丰富翻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1] [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 [M]，万俊人 朱国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 [美]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3] [俄]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二十年代文集》[M], 基辅, Next出版社, 1994。

[4]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M], 六卷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5]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Высо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Принц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СПб.:ИД «Авалонь», [M], Изд. Дом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6]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铃译, 三联书店, 1988年。